

第二章 概述公私領域理論

關於公私領域的探討，研究者希望能處理幾項公私領域的問題：第一，公私領域指的是某種實際的空間嗎？第二，公私領域是如何劃分的？第三，公私領域有沒有統合的可能？從上述幾點問題所歸納出來的討論，或許能回答本章的最後一項問題：那就是公私領域如何在教育中展現其影響力？更進一步說，教育對於公私領域所帶來之影響的因應策略又是為何？有必要優先著手開始討論的是第一項問題，根據文獻所描繪出來的公私領域形象，除了可以瞭解公私領域的輪廓外，還有助於展開對公共與私領域理論的探討。

對於本章第一項問題的簡要回應是：公私領域並不能被看成是某種確定的實際空間。Will Kymlicka 認為自由主義對公私領域的兩種不同觀點：一是來自於 John Locke (1632-1704)，是指政治與社會領域的區分；另一是受到浪漫主義影響的自由主義，指社會與個人領域的區分（劉莘譯，2003：501）。古典自由主義把國家與社會分別看成是公、私的關係，唯浪漫主義者認為社會規範仍會影響個性。換言之，浪漫主義者把社會也看成是公共領域的範疇，漸漸產生對隱私權的重視。現代自由主義採納了上述浪漫主義的觀點，對於私領域不再只是採取消極的保護而已，還開闢出安置個人隱私的領域（Ibid.: 509-510）。從「政治－社會」的公私分野與「社會－個人」的公私關係來看，可以瞭解公私領域的區分並不是那樣的絕對，而政治、社會、個人等的關係彼此錯綜複雜，相互影響，很難確切、果斷地指出那一種特定的空間或情境屬於公共或私人領域。區別公私的關係有許多不同的看法，若只把某種情境歸類為公或私領域，顯然會忽略了脈絡的複雜性。

國內的研究也有此共識，如：謝鳳儀（2003：39）從自由主義的立場認為，公私領域並非以實際的空間場合來區分，而是以公民身分及其相應的權利、義務作為劃分之依據。另外，江宜樺（2003）曾經探討公共領域之「理性溝通的可能性」，藉由闡釋 Arendt、Habermas、Isaiah Berlin（1909-1997）、John Gray 等人的主張，最後統整出公共領域的產生所需之四項條件：存在共同關心的議題、願意

瞭解他人的想法、以語言進行互動、接受較佳論證的效力。就謝鳳儀的研究來看，可以瞭解公私領域的並非以實際的空間作劃分，同時也讓人知道自由主義的並不只是單純把家庭（也就是某種具體情境、空間）看成是私領域而已；而江宜樺對公共領域的描述是從溝通的角度著手，可以看出公共領域的必須要先有所「共」，才有可能繼續開展其它互動的可能，公共領域中的那些共同分享、使用的東西就如上面謝鳳儀研究中說明之自由主義公共領域內的公民共享的是彼此之身分、權利與義務。還有陳玟伶（2003：12、17）在 Habermas 的研究中，提到德文的 *Öffentlichkeit* 有公共性、公共領域等兩種中譯，但在德文的含意中，尚包括公共、公眾、公開、廣告等意義，可見連字彙本身也有多種解釋，因此要指向某種固定、具體的情境就更不容易了。

第一節 公共領域對政治和社群的訴求

從上述說明中可以瞭解第一個問題之重要性，正是因為公私領域的概念源於不同的理念，所以無法從某一具體空間表現出來；而如何劃分公私領域的問題，更是涉及到不同意識型態對公私領域的看法。Jeff Weintraub 曾提到四種公私領域劃分的類型（引自陳玟伶，2003：14）：第一，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指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把國家與市場經濟區分了公私領域。第二，公民共和的傳統：以 Aristotle（384-322BC）的政治觀和羅馬共和的政治語言為代表，用政治社群和公民身份來討論公共領域。這種分析有別於市場和國家行政組織。第三，文化與社會歷史學的研究途徑：把公共領域視為流動且擁有各種型態的社會連帶，有別於社會組織結構和家庭生活。第四，女性主義的研究趨勢：把私領域縮小到家庭內，而家庭之外的市場經濟、社會領域等則屬於公共領域。這些劃分提供一種簡要的觀點，對釐清複雜的公私領域型態有一定的幫助；但若要把某些思想家放入某一類型中仍免不了要爭議一番。此外，學者們對公共領域本身也有不同的看法，如蔡英文（2005：226-227）認為，就公共領域的論述來說，Arendt 和 Habermas 的討論分別代表古典共和之精神、現代資本主義與自由

民主的理念，兩人觀點重疊處在於公共領域是脫離國家權力的，因而公共領域產生的輿論、批判的力量甚至會對國家權力產生某種促進或是制衡的力量。

由上段簡要地討論中，可以發現從意識型態去劃分公私領域能夠清楚看出不同立場的差別，但是對本研究而言，那種方式會產生兩點限制：一是因為彼此立場不同，所以不利於歸納出公共領域的基本概念；即使有共通之處，也會因為劃分的方式讓各種理論產生隔閡。另一是劃分方式多以公共領域為中心，對私領域的討論較少；這樣常使私領域被認為不受重視，甚至被看成是藏污納垢的地方。基於這兩點考量，研究者選擇了幾位思想家的理論作為劃分公私領域的方式，透過闡述他們的理論來歸納出有益於教育探討的公私領域概念。以這種方式討論公私領域的好處有兩點：一是可迴避掉任意把某位思想家歸入某一範疇的爭議，也可以避免處理太多政治學的歧異，而忽略本研究在教育上的目的。另一是能讓公私領域理論有對等、充分的展示空間，使私領域能在某種程度上擺脫被忽視、被壓抑等刻板印象的束縛。

壹、公共領域即政治生活：Arendt 的立場

一直以來，共和主義者的課題便在於政治生活的內容上。對此，Arendt (1995: 30-31) 的見解是，真理只能存在於那些因談話而獲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於人們不談論身邊當下碰巧發生的事，而談論他們「信以為真」(deems truth) 的事情之處。而這樣一種談話在孤獨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它屬於這樣的場域：在其中有許多聲音，每一種「信以為真」的宣告都既聯結了人們，又把他們分開，從而在那些組成世界的人之間真實地建立起一些距離。任何超出這種場域之外的真理，無論它是給人們帶來利益或災禍，嚴格來說都是「非人性的」(inhuman)。王凌雲 (2006) 以為這樣的看法顯示兩點 Arendt 政治思想的特質，一是離開政治領域的真理是非人的；二是所謂政治的真理，或是不同人信以為真的東西其實就是由不同立場所得出的意見。在 Arendt 的著作中常提及「世界」(world)，所

指的是人類交往互動的公共領域（public realm）²（王凌雲譯，2006），她相當看重屬於政治生活的公共領域，甚至認為友愛不應是私密的個人行為，而是政治的要求以及對世界的防護（Arendt, 1995: 25）。Arendt（1995: viii）認為公共領域的功能是提供一個呈顯空間來使人類的事務得以被光照亮；在這個空間裡，人們可以通過言語和行動來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們自身是誰，以及他們能做些什麼（王凌雲譯，2006）³。

Arendt 的公共領域必須要與私領域及西方近代出現的社會領域（the realm of the social）或公民社會分別開來，同時，公共領域還要跟國家的支配機制有所區別。Arendt 認為私領域屬於較隱匿、遮掩、不可見聞的事物；更簡單的說，是指某些無法被公開張揚的私密關係。公共領域則是那些能透過言行彰顯，以及運用語言表白、說服、論辯的事情。更進一步說，公共領域是行動者表現其言行、溝通、及凝聚政治權利的空間，是動態的，是間斷性而非持續性的。就實際的狀況來說，Arendt 的公共領域與希臘城邦的一樣都是指政治活動而言，而個人在公共

² Arendt 的公共領域被英譯為 public realm；大體來說，本研究把 public sphere、public space、public realm 看成是相同的東西，因為不管稱作公共領域或是公共空間，都未必是指在某種可確立的實際環境中，這個看法在處理第二章第一項問題時已經有作說明。

³ 在《人類的境況》中，Arendt 主要的焦點在於希臘城邦的政治生活內容，也就是公共領域的活動；相較之下，私領域的討論並無法看出很有系統的內容。不過作為與公共領域的另一面貌，以及與社會領域的區別，Arendt（1958: 71）直言私領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她認為完全生活在公共領域中是不可能的，人並不能夠與其他人在場的空間裡度過一生，這種全然在公共領域的生活也是淺薄的。她以為 Aristotle「人是政治的動物」的觀點是實現人類生存的最高可能，但如果沒有私人住所，則人性將不復存在（Ibid.: 64）。除了上面提到私領域的抽象性概說外，Arendt 特別在意私人財富的議題，因為城邦的興起使私人所擁有的財富有了政治的意義（Ibid.: 65）。私人財富之所以成為進入公共領域的條件是因為它保障了參與者不用為生活用品以及消費性的物質奔波，從而能自由地從事公共活動（Ibid.: 64）。除此之外，Arendt 也洞察到人類歷史中，那些隱匿在私領域裡的東西一直與人的身體有關，如奴隸的勞役與婦女的工作等通過身體的勞動來獲得生活之需要；雖然這些東西在近代雖然已經獲得解放，但仍然可以說明私領域與人身體之「需要」存在著相關性（Ibid.: 72-73）。

領域中才能保有自己的個性，也才能夠表現自己的身份與認同（蔡英文，2002：77-90）。概言之，人追求公共領域的生活，為的是彰顯、表現自身，並對法律、規範、義務等內容產生認同。個人在公共領域中的優秀與 Aristotle (384-322BC) 的德行倫理學是一致的立場，也就是表現在政治實踐之內在善中的。對 Arendt 來說，自由正是在公共領域中言行的演示或履行。這即是說，自由需要透過言語和實際行動來彰顯，而言語和行動也是建立在自由的關係上，言語和行動就是形成一種自由的公共領域生活之最重要的內容。言語和行動的政治自由優先於任何個人自由的形式，而個人的自主性以及對政治文化的認同是使上述政治實踐成為可能的要素（Ibid.: 95, 97, 103）。

實踐 Arendt 的那種公共領域的政治生活可以就下面的說明來理解。Arendt (1972: 60) 曾為文描述一種「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⁴的概念，這是出自於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的政治語彙。Thoreau 強調的是公民與法律的道德關係，而非個人良知及良知的道德義務上；Arendt 則是從與 Thoreau 相反的角度，也就是由個人良知及良知的道德義務來詮釋公民不服從（蔡佩君譯，1996：41）。Arendt (Ibid.: 60, 75-77) 曾指出公民不服從起於兩種情況：一是，當多數公民認為正當改革管道已經不可行，且民情無法抒發或不受重視時；另一是，當政府即將採取改變的行動，卻仍堅持一種已經遭到嚴重質疑的合法性及合憲性之行為模式時。此外，公民不服從具有公開與非暴力等兩項普遍被接受的特點（蔡佩君譯，1996：49-51）。很重要的一點是，雖然公民不服從與美國法律的精神是相容的，但將之融入美國法律系統，並在法律基礎上使其正當化，似乎是被禁止的。這屬於法律的本質與美國法律系統之特殊精神的衝突（Arendt,

⁴ 英譯的 civil disobedience 有兩種中譯，一是「公民反抗」（蔡佩君譯，1996）；另一是「公民不服從」（公民譯，2006）。從字面意義來看，「反抗」要比「不服從」要有更積極的意義，「反抗」帶有反對與對抗兩種雙重的意義；「不服從」似乎只有不聽從，也許有時會有陽奉陰違的情形。研究者採取比「反抗」要消極一點的「不服從」，主要是呼應 Arendt (1972: 99) 的看法，也就是公民不服從在法律的精神上雖然是被認可的，卻未必能成為立法的本質。

1972: 99；蔡佩君譯，1996：64）。這裡說明了兩件事實，第一是理論與實踐上的落差；第二是基於維持國家運作的順暢來說，由於許多的法律、政策並無法面面俱到，若是有過多的公民不服從，可能會導致法律、行政等工作癱瘓。

相較於 Arendt 的分析，Habermas 從更為細緻的歷史視野發掘出近代公民社會所發展出一種由私領域蛻變為公共領域之型式。

貳、演化的公私領域關係：Habermas 的主張

Habermas 於《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分析 18、19 世紀英、法、德的歷史，來說明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理想類型（曹衛東、王曉珏、劉北城、宋偉杰譯，1999：2）。研究者不準備把這歷史背景作鉅細靡遺的介紹，而是針對 Habermas 發掘私領域的公共性著手，概述公共領域形成的背景，及其與私領域之聯繫等相關內容。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在國家與社會的張力發展起來的，它本身一直都是私領域的一部份（Habermas, 1989: 141）。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本身又可分為文學公共領域、政治公共領域。文學公共領域起於 18 世紀的德國；政治公共領域的興起主要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原本以文學和藝術批評為特徵的公共領域逐漸政治化了，這種情況法、德皆然。以文學和藝術為主題的評論若是擴大到經濟和政治的討論，便進入政治公共領域的範疇。政治公共領域介於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運用公共輿論來調節國家（公共權力領域）和市民社會（市場經濟）的關係（Ibid.: 30-31）。在討論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劃分時，Habermas 認為必須要注意到下述事實：公共領域的理性溝通、公開批判、以及個人的自我認同等都源自於家庭功能的發揮。家庭雖然屬於私領域，卻是個人人格養成的地方，因此與公共領域有密切的關係。

文學公共領域的前身與封建制度的貴族生活有關，直到封建勢力沒落而市場經濟崛起後，過去的沙龍才與貴族的關係脫鉤。Habermas 引用 H. U. Wehler 的描述指出，直到 18 世紀德國才形成一個規模小但卻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領域，主

要由學者們、城市的居民和中產階級等閱讀的群眾所組成，閱讀的內容不只是經典著作，還包括最新的出版品。閱讀群眾的產生也在私領域中形成一種密切交流網絡；而閱讀群眾（讀者）日益增加，使書籍、雜誌、報紙等相關出版物也產量大增，出版社、書店、作家等也數量大增；另外，借書店、閱覽室、讀書會等也紛紛建立起來；此時，德國啓蒙運動後期產生的結社組織也獲得承認。Habermas 提到結社組織的進步之處在於其是由私人自願組成，在組織中成員們地位平等、自由討論、尊重多數的決策原則。在 18 世紀時，結社組織的成員多是如法官、醫生、牧師、軍官、學者等屬於有教養的階層才會參與的，這些人活躍於沙龍、咖啡館、學會或秘密團體等各種性質不同之場所，並通過那些組織產生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雖然 18 世紀的結社組織還無法讓所有階層的公民參與，但是隨著後來社會的政治平等逐漸落實，結社組織也逐漸對所有公民開放（曹衛東、王曉珏、劉北城、宋偉杰譯，1999：3）。

從 18 世紀以來漸漸形成的結社組織有三種共同的結構（Habermas, 1989: 36-37）：首先，是具備一種社會交往的方式。指一種不論社會階級的平等交往，在此基礎下，論證的權威才能壓倒社會階級。Habermas 以為由私人所構成的公眾在上述立場下，把市場與國家的力量擱置起來（雖然這在 18 世紀尚未完全出現）。其次，是公眾的討論應該限制在一般的問題上。Habermas 認為當文學、哲學、藝術等作品都經過市場被商品化、世俗化之後，公眾就需要透過合理性的溝通途徑去尋找、討論作品的意義。最後，是因為文化商品化使之成為可以公開討論的文化，這一過程使公眾不會被封閉於某一結社組織內。一旦形成穩定的團體，公眾就不再是其自身而已，而是會成為該團體的代言人、教育者。Habermas 提到藝術評論家（*kunstrichter*）便肩負著這兩種的角色。作為一位團體代言人的藝術評論家，其是一位未專業化的業餘愛好者；這種角色與所謂的專業人士不同，因為他們的判斷是出於自我的私人意識，因而不具約束的力量，他們擁有論證的權威，且其論證又能被公眾接受。再來是作為一位教育者的藝術評論家，其

會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社會、文化、道德監督者，在某些刊物中提出改進社會的措施，如舉辦慈善活動、設立貧民學校等；他們也會為文批評一些僵化、不合時宜、或是有礙文藝發展等相關評論（Ibid.: 41-43）。

上述結社組織的三種共同結構是 Habermas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理想型態，他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便已經意識到一些公共領域和私領域潛在的問題，即國家與社會的邊界日益模糊（Ibid.: 170），使得公共領域本身的理想性受到侵蝕。這起因於自由法治國家朝向社會福利國家方向發展時，產生所謂的「國家社會化」的狀況，也就是國家力量介入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內發揮某些特定的作用，上述情況常發生於為了保護弱勢與管控市場經濟的情況；另一種則是「社會國家化」，指的是社會力量超越其自身承擔起各項原屬於國家職能的政治功能的現象，如企業（私人利益團體）的組織功能日趨公共化，許多組織良好、福利完善的大型企業也從事社會建設的工作。此時家庭的功能也受到影響，Habermas 認為家庭在上述情況的衝擊之下，其功能被削弱到僅成為消費性的單位，傳統所具有的生產、照顧、供養等功能，因為政府、市場經濟、傳播媒體等公共領域的影響而日漸失去作為私人生活堡壘的功能（陳玟伶，2003：29-31）。

由上述說明可知，Habermas 注意到當公共領域與國家的距離逐漸消失，那其原本的獨立批判性也會逐漸消失；此外，大眾傳播所生產出來的文化以及廣告，也使公共領域的政治功能被削弱。Habermas 所界定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建立在公共領域和私領域的嚴格區分上。公共領域是由匯聚成公眾的私人所構成，公眾傳達社會需求給政府，而那些公眾本身便屬於私領域的一部份。如此公私領域的關係便重疊在一起，公共領域的私人化伴隨而來的問題是，原先介於國家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公共領域無法再維繫其批判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或政黨由上至下行使操縱公眾的功能。原先那種具有批判意識的公共領域在被私領域滲透之後，便會產生某些有組織的私人利益團體，其共同議論的焦點在於所屬團體之利益上，公共領域至此已然成為利益鬥爭的地方（Habermas, 1989: 175-180）。

現在要問的是，公私領域的界線日趨模糊，是否真得會阻礙公共領域之批判功能的發展？此一問題在 1990 年代，Habermas 重提公共領域時便正視了這樣的現象，公共領域在此時得到的是更為明確的延續（如溝通結構之延續）與更為廣泛、抽象性地擴展（如包含了虛擬性的公共空間），下面即是本研究的說明。

Habermas (1996: 359-360) 在其《事實與規範之間》把公共領域視為根植於公民社會結社網絡的一種溝通結構。公共領域與所謂的公民社會差別在於，公共領域是指：「那些非由政治系統來解決的問題的共鳴板 (sounding board)。就此而言，公共領域是一個預警系統，……。」(Ibid.: 359) 在陳瑋鴻 (2004: 83) 的研究中，便以簡潔的圖示說明 Habermas 把公共領域看作是介於公民社會以及法律之間的感應器。除此之外，公共領域不能被理解為具體的機構、組織、系統，也沒有具體劃定成員身份的規範結構。因此公共領域雖然可以對內劃出邊界，但對外卻是以開放、可滲透、可動的視域 (shifting horizons) 為特徵。公共領域最好被描述為一個關於溝通資訊與觀點的網絡；在該網絡中，溝通被某種特定方式加以過濾、綜合，從而結合成為特定議題的意見集合。像整個生活世界一樣，公共領域是通過溝通活動而生產出來的，它適合於日常溝通實踐的普遍性理解。相對於理解的活動來說，作為一種溝通結構的公共領域既不是日常溝通的功能，也非日常溝通的內容，而是在溝通活動中產生的社會空間。

目前的公共領域已經不受限於某個論壇、舞台、競技場等具體展示的現場，更多情況是擴展到各處的讀者、聽眾或觀眾，通過傳播媒體仲介的虛擬性在場。且一旦溝通結構普遍化之後，情境的普遍化、包容性、更高的匿名性，都要求更高的明確性，而同時又要放棄使用專業語言和特殊代碼。這意味著公共領域的溝通結構是以一般人 (laypersons)⁵ (類似上面談過的業餘愛好者) 為主要對象，

⁵ 此處中譯為「非專業人員」(童世駿譯，2003: 366)，英譯則為 laypersons。Laypersons 用於宗教的語彙中是被理解為「世俗之人」，這裡為避免與 non-professional 相混淆，研究者將該字解釋為「一般人」、「外行人」。

所以屬於領域分化的程度會有所降低，而溝通的意見與責任相分離；是故，這樣的溝通結構使公眾免於擔負決策的責任，這裡 Habermas 傾向於把決策交予決策的組織去執行。誠如上段所述，在公共領域中，成員表達之意見被依照議題及肯定／否定進行揀選，之後那些意見的集合便成為公共的輿論（public opinion）；在此，公共輿論並不僅只是統計學意義上民意之總和而已，更多情況是強調在公共領域中，針對特定議題所進行的意見形成之過程（Habermas, 1996: 361-362）。

公民同時具有兩種身份，一是作為政治公共領域的承擔者；另一是作為社會成員；在此意義下，公共領域與私領域之間交織起一種互通有無的渠道。劃定公私領域的界線在於不同的溝通條件，諸種溝通條件確保了私領域的親密性以及公共領域的公共性。但這不表示分裂了公私領域，按 Habermas 的想法，這只是不同領域間的流動與傳輸。這種看法就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過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由公眾聚集起來的私領域之型式。唯當初 Habermas 所使用的「公民社會」是針對社會勞動和商品交換的市場體系而言；現在的「公民社會」更多是指非政府、非經濟和自願的組織，Habermas 認為現在之公共領域的溝通結構紮根於生活世界的社會成分中，他特別提到組成公民社會的那些成員在私領域中所形成的共鳴，以及對私領域問題的感受、選擇與濃縮，並經過放大後引入公共領域中（Ibid.: 365-367）。

經由上面三段的說明，可以看到 1990 年代以後，Habermas 對於公共領域有更為樂觀、開闊的看法。也許可以理解 Habermas 本人也不得不接受傳播媒體與網路迅速發達之社會現狀；同時，他應該也注意到公共領域和私領域界線的模糊並不只是存在危機，公共領域的批判性不會就這樣埋沒，而私領域有機會成為提升公共領域素質的媒介；私領域本身存在的各種課題，也會成為公共領域議論的內容。至此，可以清楚看到兩個不同時期 Habermas 對公私領域的不同見解，從公私領域的區別到公私領域關係的模糊化；以及由資產階級形成之公共領域到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這種公共領域和私領域的依存、對抗、到共融的演化過程，

說明公私領域之間的密切以及不可分割之關係。

參、公共領域的共同經驗：Taylor 的觀點

與 Arendt、Habermas 等人相同的觀點，Charles Taylor 也認為公共領域是與政府有所區別的，不過他比 Arendt 和 Habermas 更在意公共領域和政府之間的合作。Taylor 以為只有積極的合作，才能確保公民的自由權，他反對個人主義式的冷漠，主張面對現代文化的各種優缺點（Taylor, 1992: 260），尋求各種可能的途徑解決政治與生活的問題。下面是本研究對 Taylor 公共領域的介紹：

Taylor 以為自由社會的公共領域有下面兩種活動：一是某種參與的過程，透過公共媒體（即非隸屬於政治系統的媒體、或政治中立的媒體）交換意見，藉以提出質疑與凝聚共識；除此之外，也包括透過談判互惠達成協議的市場經濟體系。Taylor 還深入分析兩種公民社會之公共領域的不同功能：一種是把公民社會看作是限制國家權力的角色；另一種是認為公民社會消極限制國家權力的角色雖然重要，但是結合公民與國家的功能也同樣重要。上述兩種不同功能重點在於對自由與自主看法的差異。若看重自由，那公民與國家的距離似乎將會愈來愈遠；如果看重自主，那公共領域要與國家權力所保持的距離就形同虛設。Taylor 並沒有從 Arendt 或是 Habermas 理論中找解決的辦法，他以為公共領域的意見是透過公共討論而來，在過程中有一項基本的前提，也就是參與者必須要瞭解自己所作所為的意義（李保宗譯，1997）。

這意味著參與者需要意識到一些事情，Taylor 認為構成具體民主決策之條件有三點：第一，相關的人民要瞭解自己是社群的一份子，這個社群擁有某些共同目的，並且認定其他成員也分享這些目的；第二，公民的各種團體、型態與階級的心聲能夠真正被傾聽，並在辯論中也能發揮他們的影響力；第三，由此所產生的決定，是真正為大多數人民所喜好的。至此，一種社群主義式的民主公共領域應有的輪廓就相當清楚了。換言之，公共領域的成員彼此要有所連結才行，這樣

彼此的討論、傾聽才能在一整體的關係中被接納。Taylor 反對人們以一種原子式的觀點看待自身，這樣將不利於公共領域的發展。Taylor 更進一步指出他的公共領域和 18 世紀的公共領域有兩點不同：一是 18 世紀指的似乎是某單一空間，但他提出的是一種多元化公共空間；一是他主張政治系統與公共領域的界限應該盡可能的開放 (Ibid.)。綜觀來看，Taylor 透過開放政治權力與公共領域的界限，以及公共領域中社群關係的聯繫，為擴展公共領域的論辯空間作了很大的努力。

肆、公共領域之蔽與私領域之興

透過上述介紹，至少已經看到三種公私領域的主張；前面之討論以政治哲學為主，可以看到其焦點多在於公共領域的分析與探討，而私領域並沒有被很認真、細心地對待。公共領域的議題受到許多政治、社會學家們的重視是無庸置疑的事實；然而，從 Habermas 的分析來看，私領域正是公共領域的源泉；他把原屬私領域的資產階級社會也公共領域化的目的便是看重私領域的重要性的一種表現。Arendt 是以古希臘城邦的政體作為劃分公私領域的起點，政治生活是一個人存有的重要基礎，所以公共領域的重要性便擴大到個人的自由；私領域雖然有其地位，但仍遠不及公共領域對人性之影響。相較之下，Habermas 嘗試把私領域對公共領域的影響作更詳細地闡釋；Arendt 則全心於政治生活的公共領域中，個人在私領域中並無法盡情地展現自由與個性。研究者認為，雖然 Arendt 和 Habermas 的論述分屬不同的政治傳統，但在公私領域的議題上，Habermas 跨出了正確的一步，把私領域和公共領域的關係作了實際的聯結；Arendt 對於公共領域雖有卓越的見解，但在私領域的議題上就無法與公共領域產生更具體有效的聯繫。Taylor 所劃分的公私領域與 Habermas 相似，唯 Habermas 較看重公共領域的活動內容，Taylor 則在意社群成員之間的關係在公共領域中的影響；也就是說，公共領域需要社群成員彼此共享某些目的與價值，唯有如此才能順利實踐各種活動。此外，Taylor 也有深入考量到公共領域如何與政治力量合作的議題。

上述三位思想家的論述背景受到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等的政治思潮之影響，發展出不同的立場。大致上政治哲學對於公共領域的態度採取的態度是塑造一種較為理性、重溝通以及共識形成的政治生活，並且提出對國家權力的意見及輿論。公共領域雖然與政府存在不少張力，但是從積極面來看，促進公共領域和政府的合作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演化的公私領域角度來看，公共領域是從私領域發展出來的，因此私領域的內容不只是包含理性、溝通以及共識等內容而已；還有更多非關理性、不確定性、突發的情況、以及包含各種個人的觀點、情感、慾望等私人因素。由於這些因素，以致於當人們要正視 Habermas 等人的貢獻時，便會有所躊躇；因為那些思想家似乎只著手處理私領域的其中一部份而已。此種公共領域的不足，也宣告了人們必須要正視私領域的重要性。

第二節 私領域的自身關係及親密關係

相對於公共領域，私領域的存在猶如黑與白、正與反的關係一樣；兩者並非全然的對立關係，正如黑與白也能融為各種深淺不同的灰色一樣。公共領域強調的主要內容為實現政治生活的理想，如：自願性的結社、人際互動、理性溝通、共同的議題、中立的媒體、與國家力量的距離等。而私領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私人關係，涉及自身關係以及親密關係的範疇，其中包含了各種非自願性的社群、情感與理智的交互作用、個人的想法與不同社群團體的差距等。本研究主要採取 Foucault 關注自身的理論來探討自身關係的內容，他的自身關係倫理學是一種標準的以自身角度為中心的倫理學。這種僅僅著眼於自身的關注仍然不容易概括私領域應有的特質，他雖然強調關注自身的重要性，卻未大步跨出自身關係之外去探討親密關係的諸種議題。之所以會造成上述問題可能在於 Foucault 的研究方向涉及性與權力、慾望與控制的部分，缺乏探討與愛相關的內容；這一點在 Giddens 的研究中便被看作是首要的重點。另外，也有 Lynn Jamieson 等學者用現在複雜的親密關係問題來深化 Giddens 探討的焦點。最後，研究者以教育領域所熟知的關懷倫理來探討親密關係中的人際互動情況，期望能描繪私領域的清晰

形象與豐富內容。

壹、關注自身的技術：自身關係

晚期 Foucault 對自身關係的探討遍布於《性史》中的第二卷《快感的享用》與第三卷《關注自身》中；而 1981 到 1982 年間的課堂講綱紀錄《主體詮釋學》則是幾乎用作為探討關注自身的議題上；此外，1983 到 1984 年的課堂講綱紀錄《說真話的勇氣》，也是涉及一種自我對他人的治理關係上。大致上，本研究探討自身關係此一議題便是從上述 Foucault 的論述中展開。

一、性史中的自身關係

Foucault (1990: 5) 在《性史》中指出，若不對慾望和慾望主體進行一種歷史和批判的研究，便難以分析 18 世紀以來性經驗的形成和發展。若不論 18 世紀關於性的問題，Foucault 探討性史的目的在於分析個體如何被引導去關注自身、解釋自身、認識自身和承認自身是有慾望的主體的實踐(余碧平譯，2002：125)。此企圖就如同在人生舞台的角色扮演中，把自我視為獨一無二的要角，並盡可能地透過身邊的人、事、物去凸顯自身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性。這種對自我主體性的揭露與彰顯，是接下來要探討的重點。

根據 Foucault (1990: 92-93) 的分析，古希臘對快感的道德反思並不在於將行為規範化，也不是形成一種主體的詮釋學，而是達到一種態度的風格化 (stylization of attitudes) 和一種生存美學 (aesthetics of existence)。風格化來自於性活動或實踐的範疇中何者該作或何者不該作的事情。這並不是因為出於保守或羞於啓齒，主要是因為性節制是一種帶有自我控制型式的自由的應用。自我控制表現為主體在自己的男性活動中自制的方式，以及他在與其他人的關係中與自己發生關係的方式(余碧平譯，2002：194)。自我控制所包含的面向足以使人們思考一種自身關係的倫理學面貌。在該面貌中，風格化成為塑造獨特的主體性的方向，每個人都必須要在自我的風格化中，掌握對自己以及與他人相處的各種關

係，可以說風格化屬於自我陶冶、規範的倫理學型式。下面說明將有益於對風格化的理解。

在《快感的享用》裡，Foucault (1990: 93) 從醫學、哲學的角度去反思男人們藉以形成自己行為的生存實踐（養生法、家庭治理、戀愛行為中的求愛等實踐），並指出這樣的反思如何成為諸種風格化的性行為。首先，在〈養生法〉（Dietetics）中，風格化是指個體與自己身體發生日常關係的藝術；而〈家政學〉（Economics）的風格化是談作為一家之主的男人之行為藝術；最後，〈性愛論〉（Erotics）的風格化則是探討男人與男童在戀愛關係中互動的藝術（余碧平譯，2002：195）。風格化展現出來的自身關係倫理學內容並不是某種特定的行為規範，或是既定的修養內容。從上面敘述可看到風格化屬於個人與自身、與他人之互動關係的藝術。如果以藝術的角度去看待風格化之本質，那所表現出來的活動又為何呢？

回答上面的問題之前，可以先就一些描述來看。首先，〈家政學〉探討的重點在於男人的節制（moderation）與女人的德行（virtue）上，妻子的德行構成了一種順從行為的相關物和保證；男人的節制則屬於一種自我約束的統治倫理（self-delimiting domination）（Foucault, 1990: 183-184；余碧平譯，2002：273-274）。其次，整個〈性愛論〉都圍繞在年輕人的青春與美麗吸引許多男人去設法戰勝這一艱難時期裡如何獲得壓倒自我和其它人的雙重優勢的問題展開的；也就是說，在不節制自我權力的情況下，對自身的控制和採取最佳方式與他人權力進行較量。相較之下，探討〈養生法〉之問題主要是治理（mastery）自我和危險行為的激烈性；而討論〈家政學〉的重點則在支配（control）的問題上，即人們在對妻子行使權力（authority）的實踐中應該控制自我的問題（Foucault, 1990: 212；余碧平譯，2002：300）。整體來看，每一種風格化的藝術都有不同的實踐內容，這種藝術的展現在如：節制、自我控制、治理、支配等涉及到自我、自我與他人、自我與權力、自我與慾望等自身關係議題的處理上。

上述內容都是以一種主體性倫理學的角度去思考的自身關係。接著，再回到養生法來說明個人對自己身體的重視。首先，養生法是對自我身體的一種審慎實踐，其要求對身體及其活動保持警惕，對於個人來說就需要兩種特殊的關注方式，一是對連續活動的關注，也就是各種活動的能依照其價值、互補的順序來進行；另一是對環境的警惕（*circumstantial vigilance*），即對外部世界和其各種要素和感覺保持非常敏銳及廣泛的關注。其次，Foucault 認為作為一種生存藝術（*art of existence*）的養生法，那是一整套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對自己的身體有恰當、必要和充分關心主體的方式。如此一來，便能使個體有足以面對各種狀況的能力（Foucault, 1990: 106-108；余碧平譯，2002：209-211）。這樣說來，自身關係並非只是單純的風格化的意義而已，在其中尚蘊含有連續性、脈絡性、整體性之內涵。連續性說明了自我對所經驗到的諸種活動、價值的一種聯繫能力，也意味著那些經驗內容有被組織為一連續性經驗的必要性。脈絡性則顯示自我對環境之覺察、感知、體驗及發現等的重要性。整體性意味著一種自身關係的倫理學不是泛泛之談，也非零散瑣碎的教條或原則；而是作為一種整體的、有系列的關注自身的方式。

整體來說，我們可以從 Foucault 那裡得到關於展現自我控制、實踐等涉及到風格化的自身關係之啓示。用一種 Foucault 談養生法的語氣來說：自我的實踐意味著人要承認自己是不完善、需要改進和教育的個體。這種個體不但要能感受到自己的病痛，也要關心自己或是讓有能力的他人來關心自己。每個人都應該發現自己有必要接受醫治和救助的需要（Foucault, 1990: 57；余碧平譯，2002：394）。上面已經說明了看重主體性的自身關係倫理學，其實踐的焦點在於關注自身，接下來研究者便以說真話此一涉及自身關係的技術為例，具體呈現出如何實踐關注自身的內涵。

二、關注自身與說真話

從 Foucault (1990: 44-46) 對希羅時期的分析中，可以瞭解關注自身是希臘文化中一項古老的論題。Plato (427-347 BC) 的《申辯篇》(*Apology*) 就明示 Socrates (469-399 BC) 對於關注自身的重視；Zeno (340-265 BC) 最初給門徒的訓誡就是關注自己的靈魂；Epicurus (341-270 BC) 以為關注自我的靈魂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余碧平譯，2002: 383-387)。關注自身此一概念的主要是在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時期遭到遺忘。Descartes 的主體具有無庸置疑的自明性，但是與 Socrates 的「認識你自己」產生莫大的差距。照 Descartes 那種簡單的原則重新確立的「認識你自己」的地位，是對關注自身的貶低，甚至是將關注自身排除在現代哲學思想之外。Foucault 把哲學思維看作「是什麼允許主體達到真理」，試圖在其中規定各種條件和限制；而所謂的精神性就是指，主體為了達至真理所塑造自己的探究、實踐和體驗。Foucault 主張，對精神性而言，認識活動需有通過某種主體的改變來作準備、陪伴、配合和完成，才能給出通往真理的道路 (余碧平譯，2005: 15-17)。

按 Foucault (1990: 48-52) 對歷史的考察，西元前 5 到西元 5 世紀的關注自身有下面幾項重點：第一，關注自身是沒有年齡限制的，它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人生中某一時期的簡單準備。人必須終其一生以自己為對象的關注自身，這樣才有可能去照顧他人。這即是一種轉向自身的概念，其目標在於確立某些與自身的關係，駕馭自己、完善地控制自己，或使以一種自我愉悅的方式被表現出來。大體上，Plato 學派特別重視回憶，此一透過回憶心靈所發現的自身，才能真正地把握自己。第二，關注自身強調一種完善教學的培養方式，其內容包含對自身錯誤的批判；還有是自身修養為永遠的鬥爭活動，在這過程中會需要各種用來戰勝自己的勇氣和武器；另外是帶有醫學意味的治療功能，即一種療癒靈魂疾病的功能。第三，關注自身不是孤立於社會的獨處訓練，而是真正的社會實踐。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有助於修養卓越的靈魂；更進一步說，存在各種在關注自身中讓

人可以接受其他人幫助的共同訓練，也就是「接受他人的幫助」(余碧平譯，2002：387-390；余碧平譯，2005：514-516；高宣揚，2005：434)。

上面已經提過關注自身並不是泛泛的態度，也不是零散的注意力。與關注自身有密切關係的是「說真話」(*parrhêsia*)⁶，這個概念應該是指諸種關注自身的技藝之一。Foucault 曾指出，說真話一詞的普遍道德意義在哲學、修身藝術與實踐中有著非常具體的技術意義，而且也涉及語言和說話在哲學家精神修行中的作用(余碧平譯，2005：381)。在說真話的實踐中，Foucault (2001: 108) 從歷史脈絡中區分了三種關係：第一，說真話作為一種活動，出現在小團體的框架中，或是在社群生活的脈絡裡。第二，說真話能出現在人類關係的公共生活之架構下；第三，說真話也出現在私人關係的脈絡之中(鄭義愷譯，2005：159)。

另外，還可以從下面 Foucault 的分析來更清楚理解他對說真話的定位及看法。Foucault (2001: 105-108) 把希羅文化興起的說真話型式刻畫如下：第一，說真話在希羅文化的哲學出現時，並不是一套概念或主題，而是一套實踐，它試著要型塑個人對自身的特定關係。Foucault 以為辨認一位說真話者的決定性標準要在說真話者的真理(logos)和生活(bios)之間的和諧中找到。第二，說真話的目標是要讓某人相信，他必須要關心自己與他人；這意味著他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Foucault 指出，在哲學實踐中的說真話，改變自己不僅只是改變自己信念或是意見而已，還有自己的生活風格、自己跟他人的關係、以及自己跟自己的關係。第三，說真話的實踐隱含了自我和真理的複雜聯結，也就是追求真理的自我以及探究自我的真理這樣的循環關係(鄭義愷譯，2005：156-159)。

Foucault (2001: 11-20) 歸納西元前 5 世紀至西元 5 世紀間，關於「說真話」的幾項內涵：坦率(frankness)、真理(truth)、危險(danger)、批評(criticism)、義務(duty)等。從「坦率」的角度來說，一位說真話者，總是對他人直截了當、

6 在此把 *parrhêsia* 理解為「說真話」較有助於行文的流暢。

清楚明確地表達出自己真正的信念，這一過程並不會有像是拐彎抹角、操弄心機的狀況。此外，說真話者的信念與真理是一致的，這意味著說真話者所擁有的某些道德品行能確保其說真話所具有的真理。說真話本身也存在著風險，勇於面對說真話的種種可能的危險是一位說真話者的堅定立場，這樣的人相信如果為了逃避危險而選擇了安逸的生活，那真話將被永遠埋沒。說真話者對於某些人來說也有一種批評的作用，唯在此情境中，說真話者總是處於較低的地位或是沒有權力一方。說真話更是一項義務，一種無人驅使的自發性行為。整體來說，說真話是一種口語活動，在其中，講者因其直率而與真理有一特殊關係，因危險而與自己的生命有一特殊關係，因批評（自我批評或是批評他人）而與他自己或他人有一特殊關係，因自由和義務而與道德法則有特殊關係（鄭義愷譯，2005：46-57）。

根據 Foucault（2001: 71-73）考察歷史後的分析，說真話具有正面和負面的意義，這裡便牽引出一連串的問題，開展出說真話的問題化（*problematizing*）之內容，主要有兩點：首先，誰有資格說真話？更進一步說，就是指說真話是屬於特定人所使用的還是普遍能被大眾自由使用的？第二個問題是說真話跟知識與教育的關係。說真話需要教育的支持，問題在於這種教育的內容是什麼？Foucault 把上述問題歸結為對真理與民主的質疑（鄭義愷譯，2005：119-121）。問題化在 Foucault 的思想史探究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作用除了可以不斷向外發掘、擴展某一概念的廣度外；還有透過如外力入侵的方式，使原有的概念架構受到挑戰、危機，進一步發生修正或轉變，這種外力就如同 Thomas Kuhn（1922-1996）的異例（*anomalies*）一樣，可能會產生如科學革命般的轉變。

貳、不可或缺的他人：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向來是私人生活的重心。社會學常把私人生活的深遠影響力，私人關係對社會凝聚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友誼、性向、慾望等視為社會發展中極重要的內容。標誌親密關係最明顯的特徵是屬於特定兩人之間的關係（relationship）。此時的關係指的是自我與另一個人親近且持續的情感維繫（Giddens, 1992: 58）。在 Foucault 那裡也可以看到對關係的相關討論。Foucault 強調關注自身的人必須賦予婚姻生活一種反思的型式與特殊風格。這種風格及其節制要求，不只是由控制自我和爲了指揮別人而必須管好自我的原則來界定的，還要用確立某種相互性的方式來界定（余碧平譯，2002：483-484）。這意味著關注自身存在著某種與他人建立的相互關係，因爲自我控制與指揮別人透露出與他人建立關係的一種途徑，如約束自我才能管教別人，Foucault 則是在婚姻生活探討此一議題。

婚姻所要求的行爲風格就是，配偶雙方都把自己的生活當作一種兩人生活，他們一起形成一種共同生活。這種生存風格首先是以一種共同生活的藝術爲標誌的。此外，共同生活的藝術也是說話的藝術，即夫妻之間交流的活動。婚姻生活還應該是構成一個新的二人統一體的藝術。這種倫理統一體重視和諧的關係，也就是夫妻之間的相互配合，比相互配合更進一步的，還有完全融合的隱喻，即婚姻的水乳交融狀態，通常需要具有愛情的婚姻才能實現這種狀態。Foucault 提到婚姻生活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自身的關注和對兩人生活的關注是密切相關的。也就是說，當配偶對自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時，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就必定是和諧的，所以婚姻生活可以是一種完全屬於自我的教化（Ibid.: 481-483）。在上面的敘述中，Foucault 描述婚姻生活是彼此都明白正在形成一種兩人的生活型式，同時這也是融爲一體的生活型式。也就是說，關注自身及關注兩人的生活同時存在，而婚姻的和諧與否就在於兩人彼此心意相通的程度。這是相當寶貴的例子，因爲 Foucault 難得在關注自身之外強調兩人共同的關係，特別是從婚姻去

探討私人的親密關係。

Giddens(1992: 34)的分析是從 Foucault 未深入探討之愛的本質出發。Giddens (Ibid.: 58) 指出一種「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 的親密關係發展狀況，說明一種沒有外在關係而達成的社會關係，它只是因為個人可以藉由與另一個人的緊密聯繫中而有所獲，這樣一種情境只有在關係雙方都對關係滿意的情況下才能持續下去。純粹關係之重要性在於其關切個人在親密關係中相互了解對方的特質，雙方以平等自決的態度在關係中不斷進行溝通，獲得使彼此都能滿意的關係。這種方式除了有助於個體自我反思外，還會因為個體不斷地反思，使自我敘事產生流動與轉變，而且常常需要加以修正。現代親密關係發展的最大推手是來自女性，純粹關係的發生便是源於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者欲解放受到感情與婚姻折磨的女性，因而倡導關係的自主性，引發了對於性和情感平等的訴求。Giddens 認為純粹關係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可能；純粹關係最需要的是不間斷的協商，以便因應不斷改變的環境或是自我的敘事。這裡隱含的問題是，在親密關係中，若一個人的自主性愈高，在遭遇情感的挫折時（環境的改變），所感受的痛苦也最為嚴重。Giddens 以為上述問題才會促使當事人在預見這種情況前，盡力去創造彼此都能滿意的關係才行（袁碩成，2005）。

雖然純粹關係表現出私領域民主化的平等和自主之面貌。仍有學者如 Lynn Jamieson 質疑 Giddens 所謂的反思性將導致親密關係的脆弱與不穩定（蔡明璋譯，2002：vii）。在 Jamieson 對傳統的性與婚姻關係之分析中提到，由於受父權及宗教法律等的影響，傳統的夫妻或親子關係的發展許多規範、責任與地位的限制，這些不但有礙親密關係的建立，也使女性長期受到壓抑。婚姻發展為兩人平等與自主的關係是在 20 世紀中期以後才成為較普遍的現象（Ibid.: 28-29）。婚姻的平等與自主關係常見於下面情況，如親子彼此的尊重、關愛；還有家庭成員的分工，會考慮彼此情感上的付出，以及女性在生養子女同時也要從事職場工作的問題。Jamieson 以為 Giddens 的純粹關係提供現代人更深層的反思自己所需要的

是何種私人關係。自我反思促使兩人相互瞭解彼此的想法，它要在共同的理解與共同的文化中深入發掘與創造出來的 (Ibid.: 45)。Jamieson 認為純粹關係之脆弱也就在於雙方若彼此無法滿足，那關係便無以為繼；而自我反思的結果可能會流於過度的自我滿足與保護的自戀式個人主義，導致無法對他人做出承諾，這種私有摧毀親密關係的可能。

Jamieson 從文獻的佐證中指出，現代親密關係未必如 Giddens 等人所設想的那樣朝著平等、自主的私人關係中發展。而 Jamieson 本身更從親子、伴侶與友誼等關係的分析中，證明了現代社會的變遷未必朝向「揭露式親密關係」(disclosing intimacy)⁷的目標。這種問題凸顯親密關係的深度與複雜性，也就是說，除了彼此的瞭解之外，無條件的愛情、支持與照顧仍然比揭露式親密關係佔有更舉足輕重的位置 (Ibid.: 192)。無法達到揭露式親密關係的可能原因仍在於親密關係中性別的差異，如家事之分工、家人間的情感交流；友誼則常受到性別分化的影響而表現出不同的交往特質；性關係也可能因為男女需求不同而產生問題等。按 Jamieson 的看法，20 世紀末私人生活並沒有增加太多的揭露式親密關係或是純粹關係，反而因為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使親密關係變得更加脆弱，因為人們愈來愈把關係看得太過單純。唯 Jamieson 對此並沒有提出有力的改善方案，只是重申實際的協商行動在親密關係中，能為瞭解彼此而進行學習與調整，藉以維繫或深化彼此的關係，甚至達到社會變遷的目的 (Ibid.: 199-210)。

這一部份的探討到目前為止，大致可以看到親密關係的一些特徵，如：特定兩人之間的關係、作為一種私人生活的重心、以及現代親密關係發展的最大推手

⁷ 這裡所謂的親密關係，通常是指一種很確切的瞭解、關愛，並且親近一個人的方式。Jamieson 認為「揭露式親密關係」(disclosing intimacy) 指的是鼓勵交談、聆聽、分享想法，將感情表達出來等強調雙方的揭露表白，不時將內心的想法和感覺吐露出來。Jamieson 認為揭露式親密關係必然包括親近結合、特許知識 (privileged knowledge)、深知與瞭解，以及某種形式的愛，但卻不必包含實際行動的關懷和分享 (蔡明璋譯，2002：2、4、16-17)。

是來自女性等。Foucault 讓人發現除了關注自身外，還存在關注兩人關係的部分；Giddens 的純粹關係指出私領域民主化的平等和自主之面貌；而 Jamieson 提供有力的證據說明現代親密關係距離純粹關係與揭露是親密關係的距離，讓人們清楚理解到建構親密關係的私人社會仍有待更多實際行動的投入。上述三位學者從社會學的分析讓人們意識到親密關係的特質以及存在的問題。如果我們欲從教育領域探討親密關係，就需要考慮到上面討論的親密關係之特徵，與上面幾位社會學者關注的焦點有相似之處的是關懷倫理的內涵，研究者從教育學者 Noddings 的理論來闡述關懷倫理的教育與親密關係的內容。

一、關懷倫理與私領域的關係

將關懷倫理看成是親密關係的一環在於兩項原因：首先，它是從女性經驗（很大程度上是指母職角色的經驗）出發的一種倫理態度；這種立場有別於傳統以男性為中心，從正義、公平，及道德原則、命令等道德觀點。其次，它強調的「關係」明確地凸顯在自身關係之外，自我能與他人建立起親密的互動行為。

關懷倫理的提出對私領域的影響有二：一是可以使人認真對待甚少受到重視的女性經驗；另一是從「關係」的角度去詮釋自我的存有論基礎，這使人們在面對道德問題時，不得不同時考量自我情感、理性、情境脈絡等的影響。相對於公共領域把政治生活塑造為普遍與理性的象徵，關懷倫理並不局限於公共領域政治生活的本質，為私領域的豐富內涵給予很大的積極意義。

Noddings 把性別關係與公私領域作了正確地闡述：「如果男人、女人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完全地參與公私領域。女人會有更為情境的自我形象支持自己，在私領域中更愉悅地關懷，而在公共領域也能堅持關懷；男人分擔家居生活責任，可以學習到它真正的喜悅和自我再生的可能性。」（Noddings, 1984: 127）一直以來，倫理學總是以一種父親的語言來討論，諸如：原理、命題、論證，以及正義、公平等術語；而另一種關於母親的聲音往往是沈寂的，也就是說，人類的

關懷以及對關懷和被關懷的記憶，都被當成道德行為的結果而未受應有的重視 (Ibid.: 1-2)。Noddings (Ibid.: 2) 認為，女性有別於男性為中心的道德之處在於，當女性面對道德兩難時，會考慮更多的資訊，透過與當事人交談，觀察眼神與表情，以便於接納當事人的感受。可以說女性是在真實的脈絡中做出道德決定。另外，女性行動的理由通常指向情感、需求、印象與個人情感，而非某種道德原則原理的運用 (Ibid.: 3)。換言之，關懷倫理學在女性最深沈的意識裡，立基於情感的接納 (receptivity)、關懷者與被關懷者之關係 (relatedness)、以及在接納及關係中存在的責任 (responsibility)，這些東西也就是一種道德態度而非局限於道德推理的觀點 (Ibid.: 2)。

二、「關係」為關懷的核心

就 Noddings (Ibid.: 8) 的看法，雖然關懷是來自於女性的經驗，但這不表示關懷不能被男性所分享。研究者以為正因為不願被局限在女性經驗中，而使 Noddings 把關懷訴諸一種普遍的情況；唯這種態度卻可能喪失妥善解釋女性經驗的可能。如果更進一步地解析女性經驗的內涵，或許更有助於說明私領域中，個人如何建構親密關係的各種環節。雖然有此不足，但就本研究來說，關懷倫理還是提供了足以使我們反思親密關係的基本論點。

Noddings (Ibid.: 128) 認為女性經驗中的母職不是一種角色，而是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可理解為親子關係，或是用現在常說的親職關係亦可。在私領域中，親子的議題是最常被提及的部分，孩子的成長、教育過程中，至親常一同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最近的社會學研究中，有討論如何扮演好母親的角色，以及單親家庭對小孩的影響，女性主義者也在乎父母親如何平均分擔親職的角色。以鉅觀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探討親職關係的民主化、由親職結構引發的各種社會、教育政策也成為相當受人注目的議題。本研究不準備為親職關係作深入而詳盡的探討，就像研究者無法仔細分析各種公共領域的運作型態一樣。不過若要把握親密關係的一些基本內涵，或許本研究可以提供足以啟發的線索。

關懷倫理強調關懷者與被關懷者的關係，以及接受關懷者的角色（曾漢塘、林季薇譯，2000：372）。關係的實現常伴隨著喜悅，而喜悅是接受關懷的一種特殊情感。對關懷者而言，喜悅是主要的回饋，喜悅可增進道德理想的成長，也可使人們願意與喜悅保持直接聯繫（Ibid.: 132）。另外，道德行為根源存在於兩種關係密切的情感中，一是為他人著想，另一是為最理想之自我著想。最理想的自我會接受和維持最初的情感，而非拒絕它（Ibid.: 80）。

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在關懷倫理中自我的關係。Noddings（2002: 117）認為自我像共同建構的腳本，指導並詮釋有機體的活動，有機體與類似腳本的自我共同構成一個人。她以這樣的看法來反駁兩種觀點，一是自我有根本的自由來建構其自身；另一是把自我僅僅視為由環境建構的產物。可以追問的是，自我既沒有一種可憑藉的天賦，也不盡然是被環境所塑造的產物，那自我將何去何從？Noddings（Ibid.: 99）的回應是主張自我即為關係，是動態的，也是情感與意義的核心；她並以關係作為社群基礎，社群的基礎在於其成員有共同關係（Noddings, 1996: 259）。所謂的「關係」，指的是由諸種規則所聯結的井然有序成對之物，這些規則描繪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主觀經驗（Noddings, 1984: 3-4）。而在哲學的意義上，關係是存有論的基礎，也就是說，人類關係與情感的回應是存在的基本事實；是故，可以說關懷的關係是道德之基礎。

Noddings 提過，關懷倫理否定完全自主的道德主體觀念，轉而接受相互依賴的道德事實。我們的善和成長與別人的緊緊相連。作為老師，我們依賴學生就如同學生對老師們的依賴一樣重要（曾漢塘、林季薇譯，2000：390）。可以這樣說，Noddings 的關懷倫理以互為主體的人際關係取代了全知全能的理性自我概念。那種奠基在自我與他人的關懷關係中，可能要面臨下述問題：自我如何對他人施展關懷的實踐？此問題可以就接納、回應與義務等三種關懷面向作說明。

Noddings（1984: 30）認為，接納性的自我具有一種雙重性，那就是我與他人一同看、一同感受。關懷的倫理學主張接納更廣泛的事實與情感去彰顯、召喚

人類的判斷，這種判斷考慮到處境和情勢，所以看重信賴及承諾（Ibid.: 25）。對 Noddings 來說，受關懷者與關懷者的關係是一種相互依賴且不平等的相遇（Ibid.: 65）。關懷者在於接納他人的本來面目，不妄加評論或判斷；而受關懷者接納關懷時能感受自己存在的事實。另外，關懷不是只有接納而已，也要善用各種回應方式（Ibid.: 36），視不同的情況給予眼神、言語、微笑等回應。無論是接納或是回應，自己要關懷他人，同時也被他人關懷，此時自己才有能力關懷自己。

我與他人的之間的聯結出於自己的義務感，這就是對一種理想我的回應。正是這種與他人息息相關的關懷，在自己關懷他人失敗時，能夠支持自己（Ibid.: 49）。義務受限於關係，也通過關係來劃定界限（Ibid.: 84）。也就是說，假如自己無法在對方身上完成關懷的可能性，那關懷的義務感、承諾等便無從發生。即使如此，人與人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可逃避之潛在關係，這種潛在關係使人無法逃避共同人性的關係，因而能開放自己，隨時準備去關懷任何人（Ibid.: 86）。

第三節 公私領域與教育的相關性

到目前為止，研究者從理論上將公私領域作了區隔，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公私領域的內容及彼此關係等的工作已經暫告一個段落。前面探討的內容處理了兩項問題：一是指出公私領域並不是指某種實際的空間；二是通過探討了公共領域和私領域的理論，說明公私領域是如何劃分的問題。現在需要面對第三項問題：公私領域有沒有統合的可能？關於公私領域的分合關係，在前面敘述中已經略見端倪。公共領域和私領域之間不存在具體可以一分為二的方式，無論是公共領域或是私領域的理論，都預設了公共與私人的關係，因此研究者認為，在實際的生活中，公私領域總是彼此相互影響，在本節的第一部份會真對此問題作簡要的說明。至於本章最後一項問題：「公私領域如何在教育中展現其影響力？更進一步說，教育對於公私領域所帶來之影響的因應策略又是為何？」研究者會勾勒出公私領域在教育之影響之幾項重點，並在之後的第四章結合 Dewey 的教育理論作更深入的分析與闡釋。

壹、公私領域理論的分與合

關於何為「公」何為「私」的問題，童世駿（2005：206）曾以 Immanuel Kant（1724-1804）的角度說過，一旦人們把公私領域劃界的問題在學術研討會中提出時，公私之間的界限就是一項公共的問題。換個問題來問的話，如果在私領域內普遍都遭遇到某一共同問題的話，那該問題是屬於公共領域或是私領域的問題呢？答案應該要視此一共同問題是透過什麼樣的媒介或策略來因應及處理的。舉例來說，民法被界定為私法的概念，其內容包含了運用公共手段的訴訟，也可以選擇私下的賠償或和解。換言之，原本屬於私人生活的範疇，在社會大眾共同關注下，能成為公共領域規範的一部份，但其原來具有之私領域的本質卻是不變的。從前面的探討可以知道，私領域主要的貢獻並不在於公共討論過程中，而是對彰顯自我主體的重要性提供重要的啟發，由於私領域的討論使自我的重要性成為各種社會議題不可忽視的一項焦點。另外，私領域亦提醒人們注意到人與人之間親密行為的存在與轉變，親密關係除了有助於自我理解、自我認同外，還能發掘出親密關係轉變的潛在問題。

如果從 Arendt 開始的話，她訴諸的是一種公共領域政治生活的理念，在其中雖然存在私領域，但是公共領域才是人類生活的核心；Habermas 卻從私領域汲取出公共領域形成的原因，私領域的重要性在這裡被覺察到，甚至被視為公共領域發生的基礎。在最近的主張中，Habermas 也愈來愈把私領域的內容納入公共領域的法律、溝通活動中。無論如何，即使私領域不斷地被公共領域所稀釋，Habermas 仍未刻意去主張公共與私人的一體化，他甚至更大範圍地談公共與私人的自主，把這兩種自主設想成透過溝通活動所獲致的法律型式及其所規範之諸種條件的關係（Habermas, 1992: 104）。由此看來，公私領域存在著一條抽象、模糊卻又清楚感受到它存在的界線。

再往研究者闡述的私領域來看，Foucault 的關注自身雖從未離開過自我對社會的責任，可以說關注自身是凸顯作為一位公民所必要的任務。然而，他提到人

應該時時關注自身，作為一種風格化自身的生活方式，要求人終其一生的關注自身，這便說明即使社會和諧遭遇到威脅，關注自身並不會受到外在的影響，一個人永遠是在與自己鬥爭的活動中，如自我反思、批判等。社會實踐在此只作為一種砥礪自我、修養靈魂的提供者。更進一步看說真話的技術，那是能體現在「人類關係的公共生活」以及「個人的私人關係」等脈絡中，可見 Foucault 雖未把關注自身限制在某種公共或私人的領域內，卻在實際探討的時候，透露出公私之別的看法。

關懷倫理的研究起於女性經驗，女性主義傾向於把家庭、母職、情感等概念視為私領域的一環，所以原先就有所謂公私領域之別，只是在這種意義下，私領域相對於公共領域是屬於被忽視、壓抑且缺乏力量的部分。從 Noddings 的主張來看，關懷是人類普遍具有的本質，關懷本身也講究義務感、理性、正義等道德哲學中常用的語彙。本研究更在意的是由關懷本身所引發的親密關係之重要性。私領域之親密關係與公共領域的不同之處是前者講究自我與重要他人的發展，在關懷活動中有比溝通活動更豐富的情感交流、肢體接觸、以及存在各種理智與情感之張力，那是即便人們訴諸一種普遍的關懷倫理，也無法把我與他人的親疏遠近加以普遍化；是故，公私之別也存在於關懷倫理的研究與討論中。

除了從前面的介紹來說明公私領域的關係外，研究者另外也提供一種以圖示的方式來說明兩者的關係。公私領域的關係如下圖 2-3-1 所示，一是由虛線部分所構成的私領域，另一是代表公共領域的灰色橢圓區域。圖 2-3-1 並不是要說明公私領域所佔的範圍有多大，也不是要證明公共領域和私領域是截然不同的東西。公共領域和私領域必須要放在同樣的脈絡下一起被同等關照，在前面的討論中，研究者從未把私領域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而公共領域也始終與私領域相互影響。公私領域的差別就如第一章提過的，只是兩者在所關注之社會層面上的不同罷了，並不存在可以被單一界定為公共領域或私領域的東西存在。人們要把握的是公私領域特有的重要概念，思考兩者之互動如何相輔相成，而不是在各自的

領域中各行其是，也不能輕易將公私領域劃分為不同的型式的兩種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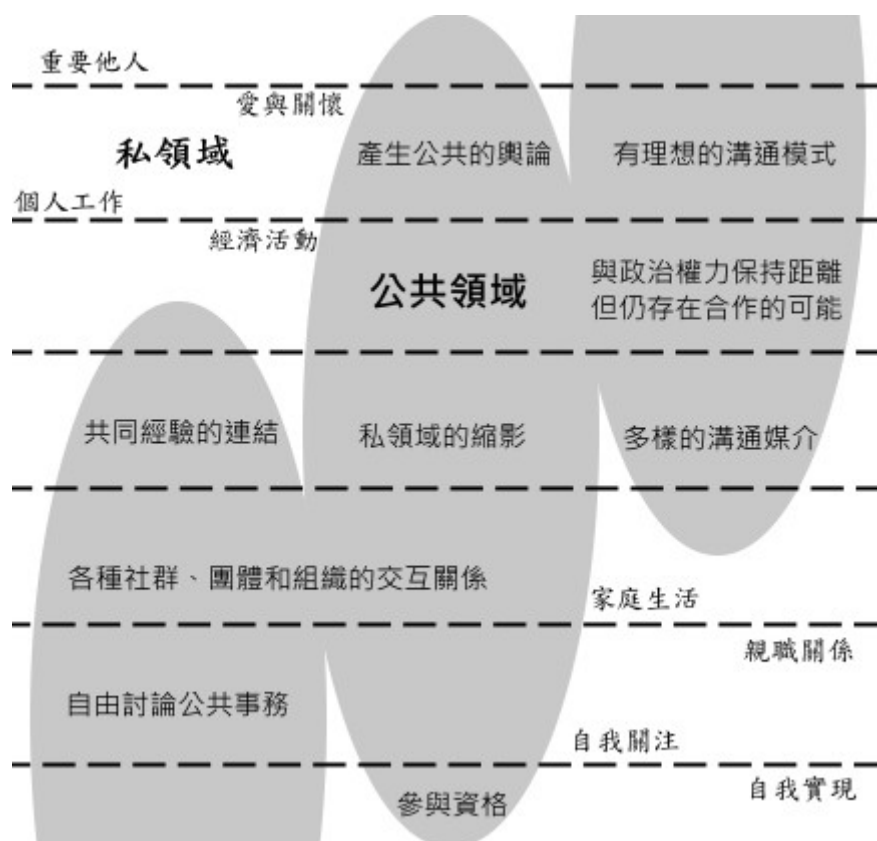


圖 2-3-1 公私領域的關係及其主要的內容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圖 2-3-1 顯示的是公私領域所代表之不同的內容，在整個社會的生活中，私領域和公共領域是相互含括的。若要更進一步瞭解兩者是如何產生交互作用的，或是要更清楚看到公共領域和私領域並存的事實，研究者提供了下圖 2-3-2 來作說明。我們把圖 2-3-2 看成是從上圖 2-3-1 擷取出來的一部份，並且觀察在公共領域和私領域的交界處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從下圖可以看到公共領域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對親密關係之變革產生了影響，這是在前面的討論中已經說明過的事情。另外，人有持續不斷關注自身的需求，在這過程中，必須要獲得他人的幫助來幫助自己成長；個人也要關心他人與社會，因為關注自身的技術強調有系統的參與社會之實踐。從上面兩例說明，應該能理解為何前面會說公私領域是並存、共融、相互合作、互為影響的關係，兩者既是整體存在的空間，但各自的內容卻也輪廓鮮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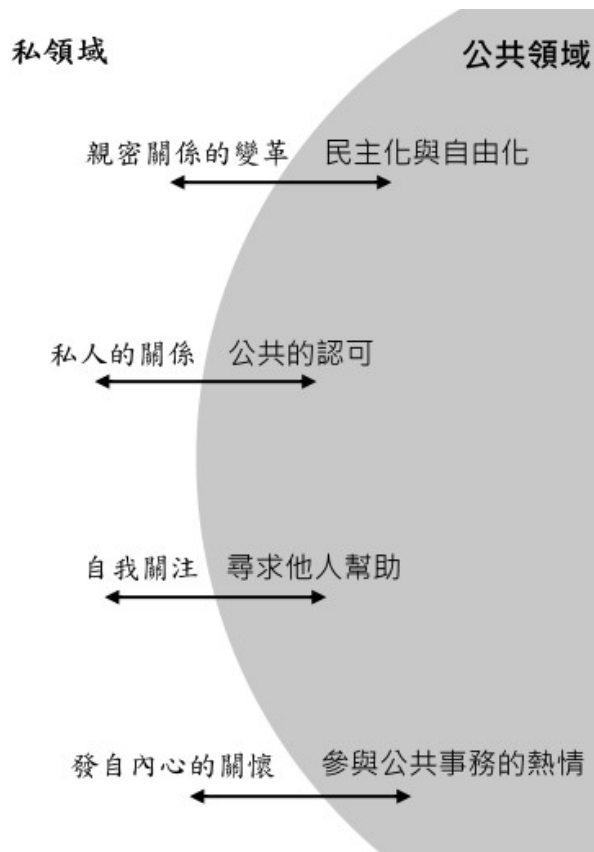


圖 2-3-2 公私領域之重要概念的相互影響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貳、公私領域在教育的開展

因為公共領域和私領域之間的分合關係，在教育上便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內容。第二章最後一項工作就是要說明公私領域如何應用於教育中。研究者從三個方面來處理：首先談公共教育的政治生活面貌；其次是私領域對教育活動的啓發；最後為公私分明的教育理論。通過這三方面的敘述，除了對本章所有關於公私領域的討論有一清楚的理解外，還能發現公私領域對教育諸種影響及聯繫。

一、公共領域的政治與教育活動

若按本研究論述的脈絡來看，公共領域的第一項重要內涵是作為一種政治生活的必要存在（參考表 2-3-1）。追求政治的生活說明人們對彼此交往互動的渴望，以及相信只有在公共領域中能得到自由與認同。作為政治生活的公共領域，人們之間的交往互動透過言談溝通得以相互理解和認可，因而公共領域是個性獲

得認同以及意見、權利得以行使的地方。公共領域本身亦是動態且間斷性的，這說明公共領域可以被擴大也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如果公共領域的活動都指向政治生活中所有的實踐自由，那對個人來說，自由就是實踐公共的政治生活，而不是成就自我的私人生活。把握這種以政治生活為優先的公共領域內涵，人們將更能覺知到與他人互動的重要性，政治生活的透明公開性、可議論性也說明個人在公共領域中才能盡情展現個性，實現自我的理想。

表 2-3-1 作為政治生活的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的內涵	探討之過程
政治生活	<p style="text-align: center;">Arendt：政治生活的必要性</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真理只能存在談話中（凸顯政治生活的重要性）</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公共領域的功能是提供一個呈顯言語和行動的空間</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公共領域是動態的空間，自由、認同皆在此處彰顯</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展現在公共領域的一種實踐：公民不服從</p>

註：「↓」表示討論的順序，下表 2-3-2、2-3-3、2-3-4、1-3-5 等都屬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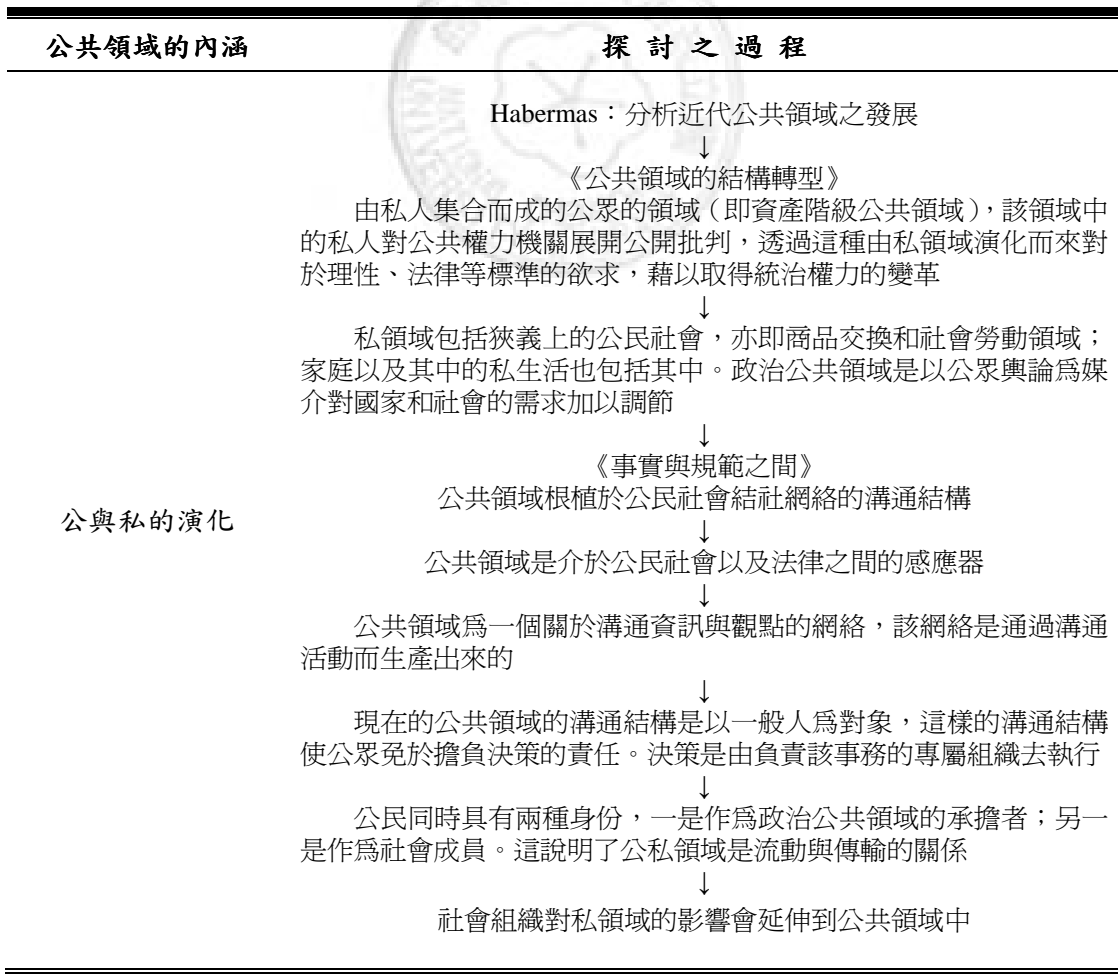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公共領域並非憑空而生，公眾之所以能溝通、討論某特定議題或事件，主要是在私領域生活中，彼此逐漸意識到公共議論的力量，以及在私領域中無法獲得解決普遍問題的力量。如果實踐一種政治生活對所有人而言是重要的，則我們可以反問：那些重要性究竟是如何產生的？人們也許會關注生活環境中的公共議題，而公共領域也可能會逐漸擴大它的功能與範圍，但是公共領域不是憑空而生，也不是突然發生，此時，考慮私領域對於公共領域的影響便有其必要。敏銳地把像是市場、家庭等私領域的內容轉變為公共領域運作的一環，成為 Habermas 最有洞見的觀點（參考表 2-3-2）。當人們愈來愈需要更多的理性以及對政府等權力機關進行批判時，私領域欠缺的力量便在公共領域被凝聚起來，進而產生輿論的力量。在早期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公共領域就這樣扮演著

中介的影響力。

上述那種公共領域的中介角色在目前所佔的份量不會減輕，公共領域已經是公民社會以及法律之間的感應器，說明了公共領域在於使公民社會有更多參與討論的必要性。這樣的公共領域除了上面提到的能動性之外，還是一種對外開放、可滲透、可動的視域。因此，公共領域是在公民社會中各種結社組織的網絡，透過溝通的結構形成的，網絡中存在著各種資訊與觀點的交流，除了充斥各種聲音之外，也有過濾、篩選不同聲音的機制。如此一來，公共領域成爲將特定議題所討論出來的內容加以整合的空間，這種看待公共領域的觀點就是把溝通活動產生的社會空間看成是公共領域的空間，公共領域變成爲一種生活世界，而不是日常溝通閒談的那種話語。

表 2-3-2 公私領域的演化關係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公民是政治公共領域的承擔者，本身也屬社會的成員之一。這說明了兩件事情，一是公私領域之間存在模糊且重複地方，彼此之間存在互通有無的網絡關係；另一是溝通的行動似乎也有公共與私人之分，兩者的差別在於上面曾提過的，也就是溝通條件、方式上的差異。在上述公私領域間互通有無的相互關係中，必須要注意下面日益增長的情況：首先，愈來愈多的非政府、非經濟、自願性的組織以不同的公共領域型態進入社會生活中；其次，這些不同形式的組織對於私領域的影響日益普遍；最後，與私領域有關的各種事務受到上述組織關注、選擇、改造、甚至是介入，最後被納入公共領域之中。

表 2-3-3 公共領域與共同經驗

公共領域的內涵	探討之過程
共同經驗	<p>Taylor：探討政治系統與公共領域的關係</p> <p>↓</p> <p>公共領域的兩種活動：參與的過程、市場經濟體系</p> <p>↓</p> <p>兩種公民社會之公共領域的不同功能：把公民社會看作是限制國家權力的角色、結合公民與國家的功能</p> <p>↓</p> <p>公共領域的成員要瞭解自己所作所為的意義</p> <p>↓</p> <p>公共領域的成員彼此之間的連結</p>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若要促進公共領域成員間的凝聚力，那認知到彼此的共同經驗將是最重要的事情（參考上表 2-3-3）。在此情況下，思考是何種共同經驗把公眾凝聚起來就是刻不容緩的議題。前面幾段的討論中，公共領域似乎就是那樣自然的發生，似乎必定會形成公共領域，因為溝通的活動無處不在。這種一相情願的想法顯然把公共領域的內涵單純化了。前面曾引述到公共領域必須要有所「共」，如存在共同關心的議題、成員有共同的身份或是認同之處，亦或是國家、文化、血緣、族群等的共同關係。公共領域的成員彼此體會到自己隸屬在某組織或社群中，便需要有能使他們產生共鳴的力量。凝聚起各種結社組織的力量，就是成員彼此的共同經驗，無論是先天的或是後天的、自願的或非自願的，如果公共領域沒有具

備團結成員的力量，那只會是如一盤散沙般的群體關係罷了。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現在公共領域的多元性已經擴展到虛擬性在場，而溝通結構的普遍化，使情境也隨之普遍化，因而公共領域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和匿名的特質。這樣一來，公共領域便無法要求參與成員擁有對某議題的高度專業知能，也就是說參與者多為一般人為主，且溝通的過程中，參與成員不需要負擔責任，決策者又不在公共領域中，因而探討的議題將不會太過專精。

思考一種實踐政治生活理想的公共教育，首要任務便是強調政治生活對於促進教育發展的重要性。這種政治生活意味著人們只有在談話中才能獲得真理，又談話本身預告了存在一種公共教育空間，在其中，人們能相互作信念、意見、想法和價值等交流。這樣的公共教育便被賦予了某種明確的立場，即相信通過公共教育的政治行動能激起改革的力量。在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中，公共教育的角色扮演能藉由意見的交流達到合乎人們期待的教育改革內容。

在公共教育的活動中，存在各式各樣的溝通結構，但不是一種日常的閒談型式，也就是說，那些構成公共教育的對話有其特殊的生活世界意含。在這種意義下，公共教育的參與者便需要接受一套有效的溝通的方式，像是 Habermas 所謂的溝通行動理論那樣的東西。尋求能使溝通意見的過程更為有效的方式，對於政策或議題的討論會有積極的幫助。公共教育在議論空間上的能動性也成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中介或感應器之角色，透過各種型式的教育論壇等有形或無形的網絡中，對相關議題進行研究與討論。

公共教育的凝聚力在於對教育議題的關注，我們無法保證每位參與的成員都擁有足夠的判斷力與知能足以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在公共教育的議論中，存在很多來自各領域，持不同意見的成員。凝聚這些人的信念、想法與意見的方式，可能只是因為對共同議題的興趣和關注；也可能是因為身處同一社區的成員、同一學校的家長。公共教育的政治生活面貌說明了每位成員的各種意見都有展示在

其中的可能。把人們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可能來自於利害相關的聯結，也包含諸種複雜交錯的社會文化重疊處。公共教育在政治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中，會因為日益民主化的政治而增加與政府合作的空間；同時也會因為社會的多元化、自由化，而更敏於覺察潛在的問題，隨時予以現狀作有力的批判與改變的建議。

二、私領域對教育活動的啟發

自身關係的重點在於使人專注於追求自我風格化的一種生存美學（參考表 2-3-4）。風格化屬於自我對於自身以及跟他人之互動關係的藝術。每一種風格化的生存美學都有不同的實踐內容，並展現在如：節制、自我控制、治理、支配等涉及到自我、自我與他人、自我與權力、自我與慾望等自身關係議題的處理上。在自身風格化的過程中，每個人需要把握對各種經驗、價值的聯繫與統整，這也顯示在情境脈絡中觀察、探索、體驗、發現的敏感性之必要。就整體來說，無論是遭遇的經驗或是身處的脈絡，總是會有屬於個人的一種整體的關注自身之方式，這樣才能使風格化的生存美學被創造出來。可以說這種涉及自身關係的倫理學相信存在有那種整體、連貫的經驗與脈絡，且人們能用有系統的方式去實踐自身關係的美學內涵，這在下面的關注自身中有比較詳細的闡釋。

表 2-3-4 私領域的自身關係

私領域的內涵	探討之過程
自身關係	Foucault 的自身關係倫理學
	↓ 風格化的生存美學
	↓ 個人與自身、與他人之互動關係的藝術
	↓ 風格化的藝術展現在節制、自我控制、治理、支配等涉及到自我、自我與他人、自我與權力、自我與慾望等處
	↓ 自身關係並非只是單純的風格化的意義而已，在其中尚蘊含有連續性、脈絡性、整體性之內涵
	↓ 關注自身的個人及社會意義
	↓ 關注自身的實踐：說真話的勇氣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探討自身關係的重點在於自我主體性的揭露與彰顯這一件事情上，若要認真對待主體性倫理學，人就要懂得如何關注自身。前面曾提過關注自身的三項重點：第一，關注自身是伴隨整个人生的生活方式，通過關注自身才能去照顧別人。第二，關注自身強調的是一種完善教學的培養方式，如對自身的反思批判、自我修養、自我療癒等。第三，關注自身是真正的社會實踐，各種社會的關係有益於修養自身的靈魂；這也透露出他人可以幫助自己進行修煉。下面將分別說明上述重點的含意。

首先，關注自身把主體的位置凸顯出來，並予以實踐方面的積極意義。人要先能關注自己才能去照顧他人，這是 Foucault 自身關係的基本主張。更進一步的，還要能終其一生都對關注自己毫不懈怠。我們無法從 Foucault 那裡明確發現某種「完善」教學的培養方式，只能針對他給予的線索作教育的聯想。最顯而易見的是自我反省，對於任何涉及通過自己的認知結構所經驗到的人、事、物等經驗，持續不斷地從自己的角度去進行反思。這也說明了要對任何既定、被給予的經驗有審慎的判斷與批判能力。

其次，由修養自我所引發出來的鬥爭，表達出如前面提到的說真話之作用。說真話是一種自發性的行為，說真話者對問題展開各種批評，透過毫不掩飾的話語，以及相信自己的信念與真理之一致性，還要勇於面對說真話之後的可能的危險。上述一連串涉及自身技術的實踐就是一種自我修養的內容，可以看到說真話對於自我來說，是佈滿荆棘的道路，因而自我必須緊握堅持自己信念的工具、力量，以便不斷地與現實情境中的自己、他人展開鬥爭。另外，自我療癒的部分說明了每個人都有身心方面的不足之處，或是存在某種缺陷或問題。因而學校的工作就不只是作為培養、發展學生的地方而已；還要扮演如醫療診所的角色，去照顧、治療、清除有關身心方面的疾病。這說明了除了教學工作之外，學校還有提供「診療」的功能，為帶著不同「疾病」進入校園的學生給予身心方面的治療。

最後，Foucault 以為提供個人各種社會關係的刺激，對於修養靈魂最為有效。這說明了下述事實，也就是人可以通過他人幫助自己修煉。上述主張賦予了學校教育的正當性地位。以學校教育的角度來看，那些幫助人修養的刺激來源有教材的內容、提供學生各種輔導諮詢等建議的老師，以及學校與家庭的關係、師生關係、同儕相處等經驗、還有充分且暢通的溝通管道等，由上述內容所構成的整體學校教育圖像，就是一整套涉及自身修養的方式與技術。

繼續要來說明親密關係的重要教育意義。從下表 2-3-5 的整理來看，親密關係的提出表明了特定兩人關係的重要性。表 2-3-5 說明了下面兩件事情，首先是私人生活的內容日益受到重視；其次是對特定他人親近、持續且情感維繫的關係，與前面所提之關係各有獨特之處。我們很難把自身關係與親密關係作切割，兩者的差別僅在於根植於個人的信念、想法或情感上的不同而已。凸顯這兩種關係的差異性是希望擴展自我的生活經驗，以豐富私人生活的內涵。與前面談過的自身關係在教育上的啟發相比，親密關係所展開的又是另一別開生面的內容。

表 2-3-5 私領域的親密關係

私領域的內涵	探討之過程
親密關係	Foucault：關注自身和關注（特定）兩人之生活
	↓ Giddens：現代親密關係發展的最大推手是來自女性，而民主化是親密關係發展之趨勢
	↓ Jamieson：作為一種私人生活重心的親密關係，並不如想像那樣理想與進步，尚待許多具體的行動來加以改造
	↓ Noddings：關懷者與被關懷者之間的接納、關係、回應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在親密關係的整理中可以看到 Foucault 提到婚姻關係時，關注自身及關注兩人的生活同時存在，而婚姻的和諧與否就在於兩人彼此心意相通的程度。這裡已經很接近於對愛的本質的討論，但真正把焦點放在愛的本質上，是從 Giddens 的討論開始。Giddens 認為現代親密關係發展的最大推手是來自女性，純粹關係的

發生便是源於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者欲解放受到感情與婚姻折磨的女性，因而倡導關係的自主性，引發了對於性和情感平等的訴求。純粹關係之重要性在於其關切個人在親密關係中相互了解對方的特質，雙方以平等自決的態度在關係中不斷進行溝通，獲得使彼此都能滿意的關係。這有助於個體進行自我反思。另外純粹關係也會因為個體不斷反思所形成自我敘事的流動轉變，而常需要加以修正。前面的討論中提過，凸顯女性經驗的親密關係發展並非是一種劃地自限的策略。明白女性尋求解放的途徑，對親密關係的探討有益無害，Giddens 就是採取這種態度去闡釋日益平等化的親密關係類型。

在私人領域中，早就存在非對等的兩人關係，如無條件的付出，無怨無悔、甘之如飴的愛等等，這便屬於非對等的親密關係類型。對等的親密關係，重視兩個獨立個體的想法，有充分協商彼此看法的空間；而非對等的親密關係更多是對浪漫愛的憧憬，同時也包含了親子之間那種出自天性的愛，以及與他人辛苦建立的友愛等。是故，在親密關係中，存在著自我反思的相互理解與滿足；也有不計回報的情感付出。私領域除了有上述內容外，本身仍存在不少問題。如講究對等的純粹關係可能會流於過渡的自戀；對於個人來說，可能要擁有很高的知能或是情緒管理，才不至於使自己遭遇情感失衡產生的痛苦。至於無條件的情感付出，就現在的眼光來看，常會被一些刻板的文化偏見所濫用，如溺愛、放縱等。前面還曾提過揭露式的親密關係，這種強調雙方的揭露表白在實際生活中，也存在許多待克服的難題。

上述的親密關係所呈現的教育啓示如下面三點所述，首先，親密關係的建立確實會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民主化便是主要的考量因素。在民主的趨勢下，親密關係的探討焦點應該是如何互相尊重、共同溝通彼此想法、以及對等的情感付出等議題上。其次，對於自然流露的無條件情感來說，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或使他人展現出最大的關懷能力。最後是營造重視情感的語言交流、彼此深知理解的默契、和不同型式之愛等涉及親密關係的氛圍。

相較於前面的討論，關懷倫理似乎未仔細考量存在一種對等關係的關懷內容，但對於關懷者與受關懷者關係的刻畫頗為生動。事實上，關懷者與受關懷者的關係也難以概括為絕對的非對等關係，因為關懷會帶給人喜悅的回饋，而受關懷者的回應也會對激勵關懷者的行動。更進一步說，關懷的關係更接近義務，能關懷他人才能關懷自己，這使人無法逃避對自己與他人的責任，進而能開放自己，隨時準備去關懷任何人。關懷倫理所考量的關係是認為自我即為關係。關係是動態與情感意義的核心，更是社群的基礎。社群的成員們存在著共同的關係，那些關係是由諸種規則所聯結的井然有序成對之物，這些規則描繪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主觀經驗。

把關懷倫理放在親密關係的範疇下探討，我們可以得到下述教育的啓示。第一，雖然關懷的對象應該不分彼此，但從親密關係的角度來看，特定兩人的關係決定關懷程度的不同。第二，在關懷的過程中，無論是基於對等或非對等的立場，關懷者與受關懷者的確存在某種程度的共同關係，且這種共同關係存在於彼此之間的認知、情感等經驗中。因此，可以推知人們所展現出來之關懷行為與接受關懷的回應會受到共同關係與經驗的因素，而連帶影響關懷的程度。第三，無論如何，普遍關懷的本質存在於人與人之關係中，擴大關懷的對象與深化關懷的意義，才是落實普遍關懷理想的途徑。

三、公私分明的民主教育理論

前面討論已經把公私領域對民主教育的影響提出相關的看法。本節一開始，研究者便說明分別探討公私領域的理論工作，這種分述方式能把公共領域和私領域的議題凸顯出來。如下表 2-3-6 所示，公共領域代表的是一種以政治生活為主要面貌的生活方式，強調成員間的共同經驗與溝通的結構；私領域的焦點是個人的自身關係對於塑造出獨特自我的重要性，以及圍繞在自我周遭且不可分割的親密關係。

表 2-3-6 公私領域代表的不同內涵

公共領域的內涵	私領域的內涵
政治生活	自身關係
公與私的演化	
共同經驗	親密關係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由上述內容所描繪出來的是一種公私分明的民主教育圖像。人們可以用很多方式將公私領域統合在一起，同樣的，對於民主教育的內容也是如此。或許打從研究一開始根本就不需要大費周章地分析公私領域理論，直接把兩者看成一體的關係並放在一起探討可能更合乎現實狀況。但研究者把心思投注於一種公私分明的教育上是出於下面的看法：第一，目前以公共教育為主的探討多於私領域的內容。第二，在很大的程度上，私領域的生活佔了大半部的人生，因此本研究希望能給予私領域較為正面積極的形象。第三，型塑公私分明民主的教育理論能提供一種面對新興教育議題的觀點以及重新去審視原有教育理論的不足之處。本研究之主要工作便是應用公私領域在教育理論上，第三章會針對 Dewey 的教育理論作較完整的分析與評論，並於第四章提出改造 Dewey 的建議以及應用公私領域之概念充實 Dewey 的實際方向。